

陈思和主编

“三城记”小说系列第三辑·上海卷

发廊情话

陈思和主编

“三城记”小说系列第三辑·上海卷

发廊情话

■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发廊情话/陈思和主编.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6. 1

(三城记小说系列)

ISBN 7-5321-2931-4

I. 发… II. 陈… III. 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22173 号

责任编辑：谢 锦

封面设计：王志伟

发廊情话

陈思和 主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esle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em.com

新华书店 经销 上海港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 插页 2 字数 122,000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100 册

ISBN 7-5321-2931-4/I·2251 定价：20.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9671164

陈思和

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任复旦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中文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兼任《上海文学》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文艺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

著有文学史专著《中国新文学整体观》，学术传记《人格的发展·巴金传》，文学批评集《笔走龙蛇》、《马蹄声声碎》、《羊骚与猴骚》、《鸡鸣风雨》、《犬耕集》、《豕突集》、《写在子夜》、《牛后文录》、《谈虎谈兔》、《草心集》等。

三地知名学者独到编选眼光
上海·台北·香港“三城文学”辉映相照

“三城记”第一辑：
上海卷·女友间
台北卷·第凡内的早餐
香港卷·输水管森林

“三城记”第二辑：
上海卷·上海街情话
台北卷·微雨魂魄
香港卷·后殖民食物与爱情

序

□陈思和

《三城记》中上海卷的前两辑是安忆编选的，她编得既认真又专业，仿佛是要通过所选的作品来证明自己的小说观念，我读了这两辑小说，明显能感觉到一种鲜明而稳定的审美风格正在形成。但是，她在编第三辑的时候突然撒手不干了，又不知是怎么回事，这个项目转来转去竟转到了我的手边。先是踌躇于应答拖延了一些时候，应允下来后因为忙于其他紧要的事情，又拖延了一阵子，直到着手开始编选时，才发现这项工作实在不太好做——我在这两年主编《上海文学》的过程中，一直有意识地寻求能够体现出上海文化精神面貌的作品，但总是知音寂寂，佳作难得。什么才是理想的

属于上海这一“城”的故事？心里每每想起这个问题，也总是寂寂寥寥的感觉。这样把这项工作一拖再拖，第二个年头也已经过去了一半，在茫然中悟出安忆为什么不编下去的原因，多少也尝到了个中滋味。

但是答应了朋友的事情还总是要做的。我是知道自己的性格缺陷，就是学不会拒绝别人的要求。但是一旦应答下来的事情又马上改变性质，成了对自己的苦刑。这样零零碎碎地抽时间阅读几年前的杂志，勉为其难地选出了风格迥异的五篇作品，当然不能说是最好的作品，但至少是我读来真心喜欢的小说。这些作品，不敢说是否反映了上海的都市特征，但是在从乡镇到都市再到发达国家的多元物质背景下，多棱角多色彩地映射了社会变动中的人性变幻与精神变幻的丰富性，描述了各个历史时期的人的精神状态。上海的文学创作多半是离不开都市化的特点，但所谓“都市文学”的说法，本来就是现代都市建设尚不发达的舆论产物，而本系列是锁定了台北香港上海三城的配套小说，“都市文学”的意义就变得无足轻重，上海也不见得能以现代都市“化”而骄傲。所以文学中的人性与精神的审美比照依然是我所衡量小说是否优秀的基本标准。

我之所以要特意地指出“都市文学”的问题是有感而发的。前不久在报刊上读到一则在深圳召开的“中国当代都市文学研讨会”的会议报道，讨论都市文学本来没有什么值得奇怪，令人诧异的是记者报道会议所阐述的思路。据报道：许多评论家都不约而同地指出，中国的改革开放所启动的波澜壮阔的城市化进程，正在极大地改变着中国人的物质生活和

情感生活,改变着人们对生活的看法,也改变着人们对文学的想象。城市化进程所催生的都市文学以各种方式变相发展,至今已蔚成景观。然而,由于乡土文学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文学的主流趋向,乡土的价值观念和审美意识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左右着主流文学的创作和评论体系,因此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和评论仍然严重缺乏“都市经验”。接着还有一段报道:评论家们还指出,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生活越来越成为广泛的社会主潮,而都市文学也必将从以往的边缘地位一跃成为文学主流,文学界应该对此加以思考。因为,按照这篇报道的小标题所示:都市文学可能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这是何等触目惊心的文字。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有二十多年的历史,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也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在这期间,国家确实设计了许多经济建设的“进程”作为改革开放的阶段性目标。我们有过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有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发达社会发展的进程,有过实现小康社会的进程,也有过发展沿海城市经济和开发大西北等等进程,但是我孤陋寡闻,未曾记得什么时候宣布过“城市化的进程”?而城市化进程的目标和标志又是什么?即使把全国有计划建设的县级市也算上,也不知道是不是县级市催生了“都市文学”的出现?当然,中国的城市建设迅猛发展是事实,农村经济的衰败也是事实,可是作家应对这样的社会剧变,可以有多种的视角和多种的选择,而这篇报道的思路和口气仿佛在宣布一种历史规律的到来,仿佛是新旧交替的社会变动“必然”为文学创作指出一条“出路”:都市文学将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光明大道,而乡土文学则是将被淘汰

的文学,这才需要提醒文艺界对此“加以思考”。这样一种理论思路的出发点和讨论问题的视角,对于今天日益多元丰富的文学现象的事实有没有指导意义呢?上海一位资深的评论家读了这篇报道后对我质问道:什么时候我们的评论家又学会周扬时代的口气了?我闻之哑然,读着这样的报道,让我想起的还远不止周扬的时代,不是鲁迅的时代也遭遇过创造社的批评家们“波澜壮阔”地宣布现在进入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文学,而敢问鲁迅属于第几阶级?不是连阿Q的时代也早已经死去了吗?

我这样提出问题,一点也没有质疑都市题材是否有文学价值的意思。我生活在上海,主编着《上海文学》杂志,始终在关注着反映都市精神的文学创作。但是我觉得中国经济发展与都市经济的繁荣都不能也不应该简单化地比附文学的发展轨迹,更不能预设一个“都市文学”的模式,轻易地宣布下一轮的文学主流就非他莫属了。文学固然要密切反映社会生活的变化,但是这种反映形态也应该是充分主观化的、精神化的和审美的。比如说最近相继问世的长篇小说《妇女闲聊录》、《秦腔》、《平原》等,都是极为逼真地描述了当下农村经济的衰败和城市商品经济及其文化的对其侵蚀,但作家们对其所描述的生活状况和发展趋向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都是从各自的极端立场来描述当下农村生活。这样的作品的价值观念和审美意识理所当然地“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左右着主流文学的创作和评论体系”,(如报道所言,其实何谓“创作和评论体系”的说法也是值得推敲的。)这正是当下文学应对现实的重要标志。中国的社会结构极为复杂,各地民间文化风

俗传统都不一样，作家只能在具体的生活环境下独特地感受生活和时代的变迁，理论家也只能在具体的创作现象中及时提升作家如何理解生活的思想文化的信息。这都是极为简单的道理，但在一些呼风唤雨的传媒批评中都变得模糊起来。

提倡一种新的文学创作倾向应该尊重常识，都市的问题并不是新的问题，都市文学也不是什么新的创作思潮。在西方，左拉、德莱赛在他们的时代里就创作了辉煌的都市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画卷，在当代，文学巨匠索尔·贝娄等人早已把都市文学的精华都充分展现出来，在中国，从《海上花列传》到《子夜》，从张爱玲的海派风格到王安忆的《长恨歌》，都市题材的创作也同样经历了一条长长的探索道路，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今天的创作所面对的，不过是在前人成就上如何进一步提高的问题。都市文学什么时候成为“边缘”？还需要“以各种方式变相发展”？把早已经有之、并且始终占据了文学史的重要地位的都市文学描写成仿佛是地下文学或者潜在写作一样，以压低前人的创作成果来突出自己提倡都市文学的重要性，这本身是违反文学史实际情况的。我从报道中读到的信息，仿佛是历史将使都市文学进入一个全新时代。都市文学还在被评论家们清醒意识到“缺乏普遍叫好的力作”的情况下，已经被匆忙宣布将在“十年之后”可能“从边缘地位一跃成为文学主流”。且不说所谓的“边缘”“主流”的提法是否准确，也不说“十年以后如何如何”这种算命式预言的依据在哪里，仅仅以这样的口气来鼓吹一个“缺乏普遍叫好”的力作的文学现象，我想我们的评论家们是否太轻率了一点？今天要推动都市文学的创作真正需要的，根本不是起哄式的

鼓吹,而是应该如实地分析今天描写都市的创作为什么缺乏力作,问题的症结在哪里,而这样的实事求是的理论分析文章,我却没有读到。

我这么提出问题是因为这样的舆论导向并非始于最近的一个会议,而是作为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论思路,已经对作家和读者都产生了误导。我去年先后去甘肃与宁夏,与一些青年作家交谈,大家普遍的困惑就是:他们这么写自己深切感受到的生活是否已经被历史所淘汰?是否应该关注那些对他们来说还是很陌生的都市生活?林白创作了长篇小说《万物花开》后一度也很苦恼,因为有些批评家们都认为她写的农村生活不真实,仿佛林白只配写她的私人生活似的。我不能想象,如果我们大批的农村出身的青年作家们都必须放弃对自己所熟悉的、而且正在变化中的日常生活的观察和感受,而去追逐评论家们预支的“十年以后”的都市文学主流,一个个争着去做未来的随波逐流的弄潮儿,我们的当代文学将会出现怎样的一种结果?

二

幸好文学创作有自己的规律。一位优秀的作家生活在哪里并不重要,写什么题材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如何来感受生活、理解生活和表达生活。我们回到原来的题目,如前所述,我为本辑上海卷挑选这五篇作品,与是否描述“都市”并无关系,我所看重的仍然是文学中的人性力量与审美精神的独特。这五篇作品的作者都与上海这个城市有关联,但是他们所创

作的世界又未必是直接写上海这个“都市”，可能在某些评论家眼里，他们的价值观念和审美意识可能还是“乡土”的，但他们都贴近自己所生活的这一片土地，从中感受到诗意盎然的魅力。

如薛舒，她长期生活在上海的近郊县区，眼睛里看出去的刘湾镇是怎样的一派都市喧嚣以外的桃花源，然而这桃源里仍然有人的命运浮沉，有人的喜怒悲乐。60年代张光明是刘湾镇上的外来户，他的家庭背景是资本家，赫赫有名的酱油大王，“张家是很有钱的，过去，在这个城市也应该算是声名显赫”。薛舒轻轻一笔带过了都市的背景：“这个城市”当然是指上海而不会是刘湾镇。“文革”前出身不好的青年人被剥夺了高考升学的机会，高中一毕业，发配似地送到这个东海之滨的小镇上当营业员。像这样一个出身大户人家的青年人，温文尔雅的外表掩饰着怯懦、矜持和孤寂的性格，与眼前的世俗社会无法真正融洽起来。在过去许多作品里都读到过相类似的形象，但是在薛舒的笔下，好像暂时把张光明忘记了似的，把笔墨转向了刘湾镇——自在地铺展着一个生命力充沛、生活有情趣的民间社会。玲宝、李季生、园玉等等的生活故事与张光明的生活故事不一样，他们是按照自己的民间观念和生活逻辑在发展和演绎，是一种自由、乐观而坚强的生活选择。张光明的出现一时间迷惑了玲宝，但他们的故事没有朝悲剧的方向发展下去，薛舒这样描写两人的不对等的交流：玲宝讨好他时只记得烧猪油咸酸饭给他吃，张光明曾借过几本书给她看，但是她连半本也没看完就还给他了，还说有这工夫不如打打毛衣，纳纳鞋底。我注意到的是，这段略带一点学生

腔的描述里，并没有一般作家处理这类细节时常有的揶揄口吻，她只是用一种不含价值判断的客观陈述，小说在这客观陈述中顺理成章地推导出张光明觉得“他的女人不应该是玲宝这样的”结论，而玲宝的世俗眼睛里，也觉得“张光明在刘湾镇是找不到合适的老婆的”。如果把故事中的“找老婆”情节置换成另外一种文化理想的话，那么刘湾镇的意义就不仅仅限于自在体系里的民间社会了。民间社会虽然有它的相对稳定的价值观念，但它绝不是自我封闭的，它仍然处在不断与外界的主流社会的频繁交流与撞击中，并且改变着自己的生命因素。于是，在两个看似平行的各不相关的文化磁场中突然出现了新的碰撞。张光明看似了无生趣的生命发展轨迹里突然引发了裂变，于是就有了朝气蓬勃的阿四。阿四是刘湾镇的新的生命质，是刘湾镇的未来的希望所在。最后的故事则是一派病树前头万木春的景象，东海之滨的小镇按照自然的规律仍然在欢天喜地地变化着，旧的去新的来。原来小说真正要讲的不是落难公子张光明的风尘艳遇，而是上海的一个民间小镇的命运变化和怎样发生的变化。我注意到小说开始第一段话非常有象征性：

刘湾镇上有几大名人，阿四妈是其中之一。阿四妈的名儿挺好听的，叫玲宝。玲宝年轻时算是刘湾镇一大美人，后来嫁给了李季生，人们都说李季生有艳福。但玲宝一连生了四个女儿，人又说，李季生娶了玲宝可是断了后了，但玲宝这个名儿，李季生还是一如既往地叫着，除了他，大伙儿都已经习惯叫玲宝阿四妈了。

读完小说后才意识到这段话的意象丰富饱满。作家讲民

间美人玲宝时，先是称其为阿四妈，然后改称玲宝，倒叙出从玲宝到阿四妈的故事，也就是先有了今天的阿四的故事，才回到历史中去想象那条生命线索的轨迹。而玲宝的丈夫李季生说是“断了后”，影射了阿四并非出于其血缘，然而李季生对阿四视如己出，虽然他是唯一地称阿四妈为“玲宝”的人，却仍然分享了阿四的福分，与“后”接上了因缘。小说结尾回到了这一主题，这时候的刘湾镇已经走向“国际化”，变为“都市”了，然而对于阿四真正血缘上的父亲张光明来说，命运似乎不算公平，薛舒从容地写道：“日子还是依旧在过着，或者是如李季生和玲宝一般过得有滋有味的，也或者，像圆玉这样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后心满意足的，最多的，是如张光明这般的芸芸众生，不能说苦难，却也并不十分快乐或者说索然无味地虚度着光阴。”张光明，作为刘湾镇最初的新文化方式的传播者，他在短暂的本能冲动中延续了生命的火种以后，就像夏天黄昏中飞翔的小飞虫一样，完成了生命的辉煌和再生。然后就默默地隐没在民间社会，成为大浪淘沙的历史长河中慢慢沉淀下来的一粒沙子。新一轮的中兴年代，对于张光明来说，早已经是花非花叶非叶了。薛舒对结尾的处理虽然略显简单，但十分有力，不仅没有让刘湾镇落进庸俗历史循环的圈套，而且铺展了一股历史不可逆回，旧梦不能重拾的气势。

戴航的《猎熊黑洞溪》更不是一部写上海的小说，而且比《记忆刘湾》走得还要远。故事发生在美国，作品里仅有两个人物，一个是美国人阿瑟，另一个吴泊均曾经是个中国人，但现在已经成了美国家族中的成员，而且作家也没有明确交代过他是否来自上海。但作家笔下的这个人物的性格的某些方

面：谨慎聪明，处事周到，极度的精明和嫉妒，以及理智压抑下的睚眦必报的无意识，等等，应该说是比较典型的上海人性格，而小说里从美国人阿瑟的心目中理解的吴泊均是一个“谨慎中所包含的大度，一种无可无可的人生态度”的性格，恰恰是一种很深的误解，只有刚愎自用而又不无天真的美国人，才会犯这样的错误。

从故事的表面上看，戴航写了人性中的恶魔性因素。虽然这个故事的叙事结构和方式都很老派，人物性格发展的被揭示过程也很老派，几乎从故事一开始就可以让有阅历的读者意识到将要发生的可怕结局。但这部作品仍然有一股力量紧紧抓住读者的情绪，带着读者去经历一个又一个紧张的场面，来不断延宕真正的可怕结局的到来。“熊”的意象，在西方许多经典小说里都具有象征意义，在戴航笔下也同样如此，小说开头就说明了这两人去偷猎灰熊是违法的行径，说明了阿瑟的祖上曾经是海盗，猎熊是这两个文明社会的成功人士的一次回归天性和本能的预谋，至于他们将在自己的天性与本能中遭遇到天使还是魔鬼，那只有让命运去安排，所以，两个人物在小说一开始的行为中就带有高度的冒险性。而“熊”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充当了魔鬼的角色，犹如浮士德遭遇魔鬼的引诱一样，当熊突如其来地出现在两人的面前以后，两人之间所有靠互相信任和互相赏识而在实践中建立起来的善良、友谊和成就感彻底瓦解了，彼此心灵深处的恶魔性因素占领了上风。应该说恶魔性因素是早就潜伏在他们的无意识中，并非一日，而且某种程度上是彼此自觉的，这才会在恶魔性因素突然出现时他们完全没有惊慌失措，最后的谋杀场面

也才会写得如此诗意图。

但是,导致人物关系可怕状态的真正原因,仍然是被遮蔽在人性因素下的恶劣的生存环境。这个故事的人物结构来说,在西方文学的经典传统里有过各种各样的变形,如伟大的君王与身边的弄臣、骄傲的贵族与丑八怪的奴仆、高贵的奥塞罗与邪恶的伊阿古,等等,一种人格力量的绝对不平等关系导致了你死我活的残害与阴谋,以往的研究无不归咎为人性中的邪恶因素。但在这种主仆对立的人际关系中,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不平等是诱发兽性爆发的主要原因,心理上的耻辱感和嫉妒心,是由经济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关系引起的,也往往是由受到心理伤害一方所面临的生存危机而诱发的。这是在不平等的经济社会关系中无法克服的精神敌对性。而《猎熊黑洞溪》所展示的阿瑟与吴泊均的各种亲密关系中,雇主与雇员的关系依然是最主要的关系,制约双方的实质性的人际关系仍然是主仆的关系,尽管后者可能成为前者的继承人,但这个事实直到谋杀成功以后才被证实,因此说很难把这场谋杀归结为争夺家产的结果,其真正原因仍然是一场耻辱感与嫉妒心作祟的复仇行为。

如果我们把这个故事的人际关系放在后殖民的文化语境下加以理解,作为第三世界背景的留学生吴泊均与他的美国恩人阿瑟之间的故事就显得更加复杂。我们曾经在许多类似主题的故事里看到这样的人际关系,往往是通过两性关系来提示的,而故事的背景也可能发生在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而这个故事却把一切都反过来展现:这是两个跨国男人之间的友谊和背叛,除了缺乏同性恋的痕迹外,竟包含了一切男人

间的关系：共同的事业追求，家庭的姻缘结合，性格的善恶互补，以及同甘共苦的实践考验。但即使这样完美和亲密无间的合作，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依然在无意识中保持下来，与其说是阿瑟平时的骄横脾性刺激了吴泊均，毋宁说是吴泊均与生俱来的弱势民族的集体无意识积淀。小说里写到吴泊均心里经常出现的一种下意识的幻想：

他绑架了某超级大国总统，叫电视记者实况转播；他在摄像机前说，他绑架总统没有任何政治目的，就是要他趴在地上让他当马骑一回；记者说你这不是太荒唐了吗；他说老子高兴你怎么样；总统拒绝给他当马，他便一枪崩了总统，对电视机前的观众说：别为他流泪，调查一下，他绝对不是个好东西。

这个下意识的幻想（也可以叫做白日梦）含有丰富的内容：总统的象征；骑马的象征；翻身的象征；枪崩总统的象征。总统，来自某超级大国，其意毋须解释；骑马的意象在这里当然是属于游戏的规范，即骑与被骑的角色颠倒和更换；于是引出了对世界上各种角色的翻身欲望的理解；所谓“翻身”，指的是骑与被骑的角色在某种游戏规则中的互相替代，对于来自第三世界的公民吴泊均来说，“被骑”的压抑感肯定不是来自个人的屈辱经验，而可以被看做是集体被压抑的民族经验无意识。但是当这样一种游戏的愿望被彻底拒绝，紧接着就是暴力和毁灭，而这一切发生在电视机前面本身就显示了暴力原是一种游戏愿望的替代。那就是超级大国遭遇恐怖主义报复的结果。吴泊均的被殖民民族的暴力心理被很深地遮掩着，如作家所故意显示的，这叫做一种基因的获得性信息，上几辈子的民族屈辱的基因已经宿命地写入了他的命运里，这